

似水流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所有改变都会留下痕迹，一张老照片就是一段留不住的岁月、一个忘不掉的故事。黑白光影记录着美好的青春、艰苦的奋斗、生活的变迁，还有再也回不去，却是成年人最美的童话世界。老照片是由一群平凡的人用生活刻画的历史，看这些照片里的故事，怀念过往，珍惜今天，祝福明天！



海员的结婚照

□ 胡月祥

几十年前，在我从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前夕，学校的老师忽然间活跃起来。他们一改教书匠的矜持，经常找学生热情且神情诡秘地个别交谈，被老师谈心的同学都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我好奇地询问了一位同学，他只用一句话把我打发了：“没事，个人思想问题交流。”

那天，我正在阶梯教室最后一排复习功课，准备港监的适任考证。一位年长的专业课老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在复习功课啊？毕业后准备上哪里去？是上船工作啊？”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航海系毕业生，正踌躇满志地做着远洋船长的梦，当然希望到远洋船上去工作。

“老师，我是上海来的，我想到上海远洋公司去。”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老师听了非常高兴：“那很好呀，顺便问一下，你有女朋友了吗？有位老师的女儿很漂亮，高中毕业后在小学当老师，她非常喜欢勇敢的海员，希望在航海系同学中找一位男朋友。”

我听了老师的话，脸倏然变得通红：“老师，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不好意思，我在农村已经有女朋友了。”现在我才明白，所谓交流“个人思想问题”是啥，不过，还真有同学被“月老”们撮合成功了。

我和女朋友的老家都在上海郊区，当时正是浦东改革开放前夕，上海人的固有思维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而上海政府下定决心在浦东开发房源，改善上海人逼仄的住房条件。

这时，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有了征收撤队的消息，而女朋友家的生产队还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时只要办理了结婚证，女朋友将户口迁入我家，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工厂工作了。我们都是农民，时代给了改变我们身份的机会。

按当时的政策，毕业班的学生离校前可以在学生处开具结婚证明。我得知后，马上写信告诉已经等待了四年的女朋友，女朋友马上回信同意领证结婚。

在离开学院时，我站在凌水桥上看着熟悉的校园，在心中默默地念叨：“感谢母校的四年培养，我在远洋船上不做到船长，绝不返回校园！”

就这样，我兜里揣了大学毕业证书和结婚证明，乘客船“长山”轮回家了。巧的是我第一次坐船，就是乘“长山”轮去大连海运学院上学的。更巧的是这艘船是竟我父亲参与建造的，在甲板上还有父亲焊的焊缝。

1982年1月的春天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我到远洋公司上班了，当月我拿到了第一份月薪——48元，上船还有水陆差补贴，我的户籍也迁到公司。在大连读了四年书后，我摇身一变，有了上海市区户口，还享受了居民户口的待遇。

报到那天，我在公司供应站领了工作服——海员制服和大盖帽，帽子上有五颗红五星，这是海员特征的帽徽。上船前，我特意穿着这套海员制服和妻子拍了结婚照（如上图）。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7年夏天的老照片（右下图）。照片背景的办公楼是建在福建东山岛铜陵镇大澳渔港附近山坡的闽南渔场指挥部，我当时在闽南渔场指挥部无线电台岸台当报务员，日常负责对闽南渔场作业的各地渔船电台发布渔情、天气和通知，以及接收来自渔船电台的渔情、险情等。

每当与这张老照片对视，44年前敲击电键发报的声音仿佛又在我的耳畔响起。小时候看电影，我特别羡慕《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他背着电台，手握话筒，在敌人蜂拥前来时向指挥部连呼“向我开炮！”。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通过隐蔽的电台“嘀嘀嗒嗒”的无线电波，把有价值的情报发到延安党组织。少年时代的我对神奇的无线电波十分好奇，常常做着无线电通信的梦。

后来，我竟然梦想成真了，1974年3月我被选调到福建省水产厅下辖渔业电台当报务员，实现了对无线电的零距离接触。

有一次，好几艘东山岛铜山公社的渔船开往澎湖海区进行捕捞作业。渔船开航不久，我就接到某个海区黄花鱼旺发的渔情，当时我刚关机下班，按规定必须1个小时后再发报。但渔情就是渔获，如果耽误了，渔船离黄花鱼旺发海区就远了，不但耗费燃油，还会贻误捕金捞银的有利时机。时间就是效益，我果断请示台长，译好电码，开机呼叫，及时将这份有价值的渔情发了出去，幸好有两部渔船电台收到电报。那是集体吃“大锅饭”的年头，但队与队、船与船之间颇有协作精神，大家互相转告，部分渔船很快调头赶赴鱼发海区。

“晚上回来鱼满舱”，虽然20世纪70年代黄花鱼每斤才三五毛钱，但毕竟是名贵鱼啊，渔民们个个喜笑颜开：“如果没有无线电及时通报渔情，就没有这次大丰收！”

在我的结婚照片册里珍藏了一张泛黄的黑白二寸照片，这张照片是我父母补拍的结婚照，我拍结婚照时特地请影楼的工作人员处理后印在上面的。在我的那册装帧精美的彩色婚纱照，这张照片有点鸡立鹤群的感觉，照片上的主角不仅有我父母，还有4岁的我和2岁的小弟。

记忆翻回38年前，邻居家里来了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亲戚，他带来一台老式照相机，邻居提议让没拍过结婚照的父母补拍一张结婚照。母亲很高兴，穿上了新做的黑面白底的布鞋，和出客才穿的半新衣服，用水把头发蘸湿，梳出两条长辫子，一脸幸福知足的样子。给我也穿上了用她结婚时那件粉红的精良衣服改的上衣和短裙。照片里，我扎着两个冲天小辫，咧开嘴，一个劲地傻笑。父亲和母亲坐在一长条凳上，我

44年前的电报事

□ 展华

记得还有一回，一艘渔船刚到作业海区下网，突然有个渔民患急性阑尾炎，不急救可能有生命危险。不料“船漏偏遇打头风”，正要返航时渔船出了故障。幸好这艘渔船安装有一部功率15瓦的电台，渔船报务员及时给总台发报。我收报后，连忙通过电报联系一艘正在返航中的渔船去接病人，病危的渔民得到了及时救治，化险为夷。类似这样无线电报在海上抢险救灾中发挥的作用的事儿不胜枚举。



泛黄的记忆

□ 朱莉

坐在父亲的怀里，母亲抱着弟弟，一家四口头靠头，脸上都挂满了笑。

母亲回忆，她和父亲是拍过结婚照的，1975年春天，父亲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一层层地打开，小心翼翼地数着：“你看，有四毛钱呢。”郑重其事的样子，好像数的是四万块钱，父亲打算用这钱到县城里去照张照片。

那时候这两个已经谈婚论嫁的大龄青年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走在路上手拉着手，一路上唧唧我我，说不尽的甜言蜜语。他们一前一后朝县城走的时候，前后拉开有几十米，一路上都低着头，不说一句话，好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到了县城，他俩找人打听照相馆的地址，才得知照相馆早就关掉了。母亲想了想，对父亲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勤俭节约，不要注重物质享受。”然后又背了一大段毛主席

语录。我父亲也结结巴巴背了一大段毛主席语录，最后满怀歉意地说：“高秀同志，今天太对不起你了。”然后，他们去吃了一碗面，还给我母亲的弟弟妹妹每个人买了一个烧饼，给我母亲买了一块粉红的的确良布料，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时光荏苒，倏忽44年过去，无线电通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砖头似的“大哥大”到智能手机，与当年我们使用的电台相比，如今的手机堪称超高级微型电台，即便隔着千山万水，发条微信、视频须臾可达。渔业通信的发达，让渔家人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捕金捞银，用《洪湖赤卫队》主题曲中一句歌词概括，那就是“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那年，青海的二姨生病没人照顾，母亲让大姐去了二姨家，据说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才能到。那年，大姐还不到二十岁，第一次离家去远方，实在太想家了，就写信回来要家人的相片。母亲找来镇上专门照相的人，父亲、母亲、叔、婶坐在凳子上，我坐在母亲怀里，堂弟坐在婶的怀里，堂兄倚在父亲和叔的中间，二姐、三姐、堂姐站在后排，背景是我家的竹园。照片洗出来后，我们争着看，大人们照得很自然，我们一个个绷着小脸，傻乎乎地盯着镜头，堂兄则是闭着眼。婶不住地数落他，“别人都睁着眼，咋就你闭上了？”堂兄被数落得哭了，晚饭没吃就睡了。这张只有二寸大的黑白照片，第二天就寄给了大姐，年底大姐回家带了回来，一直由我藏着。

第二次照相是我小学毕业时照的毕业相。乡里来了个照相的，在教室外面的土墙上贴了块红布，我们就端坐在红布前的凳子上，昂首挺胸，瞪着照相机，快门一闪，自己的头像倒立着被装进了进去。这张贴在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留下很多我小学阶段的美好回忆。只是那个绿树环抱、清水绕流的校园，再也回不去了。

初二那年冬天，我和班里的团支书、文娱委员结拜为兄弟，在沙滩磕过头后，去城里的照相馆照了一张二寸的合影，洗了三张，一人保留一张。三人当时都留着学生头，因为瘦，嘴巴一律外凸，看着很可笑。那时，三颗年少的心装着义结金兰、共赴人生、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岂料转眼已各奔东西，成了为各自小家庭奔忙的普通人。所幸还有这张褪了色的老照片，见证着那份岁月里的友谊。

初中的毕业照，是我独自去学校旁边的照相馆照的。穿着军装，紧抿着双唇，显出一副绝不妥协的倔强相。我曾把这张相片送给过很多同窗，如今天各一方的同学凭着这张照片只怕难以认出我了。

这些黑白照片是我无比珍贵的记忆。翻出它们，那些静止的时光，就齐刷刷地站在面前，照片中的人儿仍是那一成不变的微笑。

母亲的四季

□ 朱凌

常想 母亲
您的青春芳华
该是什么模样
是村口的荷塘里
亭亭玉立的莲荷
还是那盛开的映日荷花
河堤上绽放的芙蓉
定是您的脸庞
碧绿妆成的垂柳
恰似您的腰肢
婀娜 多姿 妙曼
若问我
谁为你的青春出庭作证
那张压箱底的老照片
将成为呈堂证言

时光里的心事

□ 李季

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人生就是由这些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故事串成。那些老照片，不经意间吐露着时光里的心事。

那年，青海的二姨生病没人照顾，母亲让大姐去了二姨家，据说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才能到。那年，大姐还不到二十岁，第一次离家去远方，实在太想家了，就写信回来要家人的相片。母亲找来镇上专门照相的人，父亲、母亲、叔、婶坐在凳子上，我坐在母亲怀里，堂弟坐在婶的怀里，堂兄倚在父亲和叔的中间，二姐、三姐、堂姐站在后排，背景是我家的竹园。照片洗出来后，我们争着看，大人们照得很自然，我们一个个绷着小脸，傻乎乎地盯着镜头，堂兄则是闭着眼。婶不住地数落他，“别人都睁着眼，咋就你闭上了？”堂兄被数落得哭了，晚饭没吃就睡了。这张只有二寸大的黑白照片，第二天就寄给了大姐，年底大姐回家带了回来，一直由我藏着。

第二次照相是我小学毕业时照的毕业相。乡里来了个照相的，在教室外面的土墙上贴了块红布，我们就端坐在红布前的凳子上，昂首挺胸，瞪着照相机，快门一闪，自己的头像倒立着被装进了进去。这张贴在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留下很多我小学阶段的美好回忆。只是那个绿树环抱、清水绕流的校园，再也回不去了。

初二那年冬天，我和班里的团支书、文娱委员结拜为兄弟，在沙滩磕过头后，去城里的照相馆照了一张二寸的合影，洗了三张，一人保留一张。三人当时都留着学生头，因为瘦，嘴巴一律外凸，看着很可笑。那时，三颗年少的心装着义结金兰、共赴人生、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岂料转眼已各奔东西，成了为各自小家庭奔忙的普通人。所幸还有这张褪了色的老照片，见证着那份岁月里的友谊。

初中的毕业照，是我独自去学校旁边的照相馆照的。穿着军装，紧抿着双唇，显出一副绝不妥协的倔强相。我曾把这张相片送给过很多同窗，如今天各一方的同学凭着这张照片只怕难以认出我了。

这些黑白照片是我无比珍贵的记忆。翻出它们，那些静止的时光，就齐刷刷地站在面前，照片中的人儿仍是那一成不变的微笑。

